



公开

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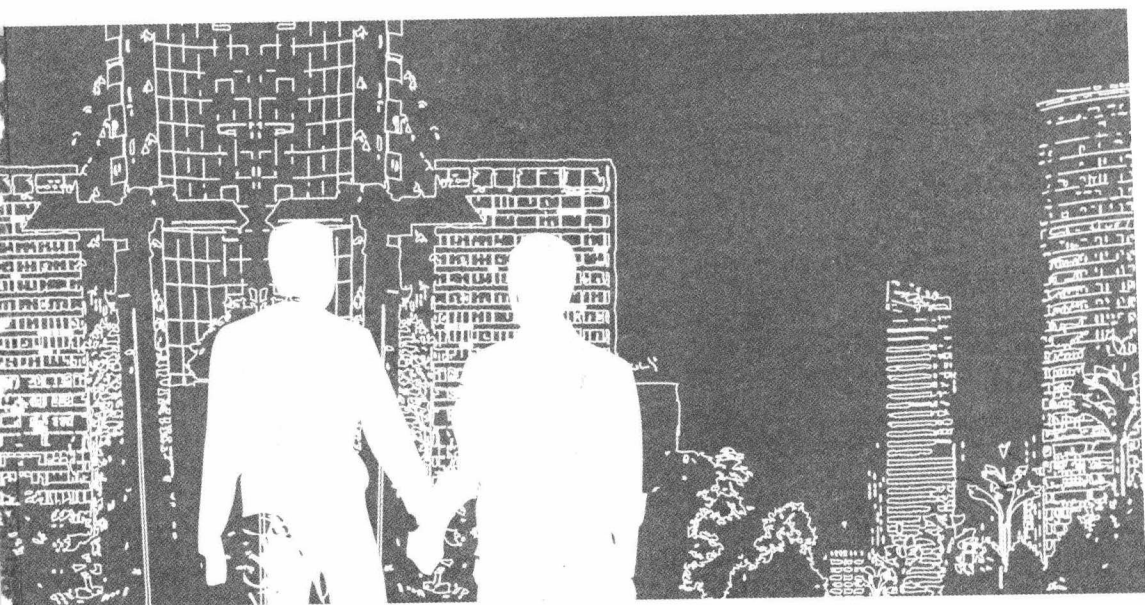
GOING PUBLIC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QUEER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ENGDU, CHINA

魏伟



中青院 11 000678845



公开

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

GOING PUBLIC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QUEER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ENGDU, CHINA

魏伟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魏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ISBN 978-7-5426-3938-7

I. ①公… II. ①魏… III. ①同性恋—研究—成都市 IV. ①D66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8919 号

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

著 者 魏 伟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何志向

装帧设计 王 立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http://www.sjpc1932.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江苏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8

书 号 ISBN 978-7-5426-3938-7/C·444

定 价 40.00 元

献给我的家人

和

所有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接纳“同志”儿女的中国家庭

序

魏伟博士的这部书稿，其实我期待已久。以我对作者学术品格的了解，我相信，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同性恋研究这个学术领域，想要关注同性恋群体在中国的真实状况，那他的研究最可能是那种有效的推力与中介。

说起来，作者的相关研究，近几年已有一些成果陆续发表在国内外几家重要的刊物上，在学术圈有不小的影响。这期间，我从他的论文中，读到过他对国内外“都市社会运动”研究的梳理、阐释，也了解到他在田野调查中对“城市性”、“空间理论”等的出色运用，可是作为他研究的核心主题的“同性恋”，却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我的视野。

人大多有一种倾向，在社会万象中，会有意无意地将某些与自己观念相左的、己所不欲的人和事，屏蔽于视野之外，只当它不存在或与己无关。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曾住在上海人民广场边

上,听人说斜对面不远处的三角小公园,已经成了个同性恋角。又听说,今天我居住的地方,弄堂口那栋被用作法国商社的小洋楼,其前身是一家同性恋酒吧。然而,自以为对各种城市空间和社会现象不乏好奇心的我,即使在成了个社会学者之后,一直也没有将这些场所、这个群体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纳入自己的视域。是的,我们都知道,同性恋人群历来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大都市中,同性恋者及其群体就活跃在我们身边和各种场所。但是,我们为了什么要去了解他/她们?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他/她们?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或事都会成为社会学认知对象的,即使其重要性无可置疑。这毫不奇怪——号称旨在帮助人类认识社会的社会学,除了有种种天然的局限,还存在有各种各样的屏蔽装置,有些被设定在学术体制之中,还有些源自于我们自身的认知倾向。很多时候,我们更愿意将“结构”、“制度”等等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我们知道那可能会导致分析的物化和责任规避。而当我们以“人”及其“行为”为对象的时候,我们也习惯于在远离自己生活世界的地方、寻找一些外在于自身群体/社区的“他者”来作为我们观察、分析的对象。即使是在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我们可能将对象视作为与自己有着某种边界之隔或身份差异的“他者”——“异常者”、“受压迫/被剥夺者”、“弱者”、“权力支配者”等等。显然,社会学者多少都有某种逃避倾向:我们不太情愿将自身确定为自己的认知对象。也所以,虽然“行为”历来被认为是社会学最重要的对象,但那些可能将研究者自身涵盖其中的有关“人”的研究(human sociology),却一直处于社会学的边缘地带。即是在各种“行为”研究中,限定对象及层次的“有限的剖析”处处可见,而关系到行为背后人类普遍的、基本的欲望及需要——就如魏伟的这项研究所涉及的“性”那样,则一直被视为另类议题或小众议

题。此外如“角色”、“身份”等,无论是作为现代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还是作为后现代社会学的时髦议题,它们大多时候其实也飘忽于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认知对象的“他们”之间。

研究者们想要逃避什么?以己度人,我想,以自身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首先需要具备不同于研究他人的特殊的能力,包括问题想象力和反观自身的能力。而最令人疑惧的,则是对自我的颠覆——对自己观念意识、欲望/需要、地位/角色、身份及行为等等的审视,不能不让人产生种种不安。在我看来,许多研究者所以回避性研究、性别研究,一些女学者(包括本人在内)且有意无意地回避女性主义研究,多少与此有关吧,虽然我们受惠于这些领域的成果已经很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以申张权利为宗旨、以特殊的解构力而引人注目的种族/民族研究、性别研究、青年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以及性研究等的兴起,“身份”、“性别”、“性”等等,无论是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对象,还是作为方法论,都已迅速普及、渗透于各个研究领域。

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有关“学者逃避”问题的实质。以同性恋研究为例,其实对许多研究者来说,这是个不难将对象界定为“他者”的议题,在一些人眼中甚至也不难将其归入“异常”一类。这些本不会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障碍,就如同社会学者对族群性或越轨行为的研究那样。那么,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去关注和了解“同性恋”这样一个我们其实并不怀疑(起码我自己一直这么认为)其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

在魏伟的这项研究中,我上述这些疑惑,并不是他要正面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在这本书稿中,我却似乎找到了答案所在:与其他“性”、“性别”研究一样,同性恋研究,其实是有关人类自身的研究!同性恋者及同性恋群体所感受、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实在

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且都在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除了有关性的欲望、需要、行为以及规范等人所共同面对的议题之外,“同性恋”正是人类社会集体建构的产物,且是相对于“异性恋”、在与“异性恋”的复杂关系中被建构而成的。就此而论,没有谁是局外人。而且,当同性恋者获得、或被赋予一种特殊身份的时候,非同性恋者也将接受或被赋予“异性恋者”的身份,不管他(她)是否情愿。魏伟的这项研究,足以让读者们理解这一点。同时,这项以“批判的人道主义”为追求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同性恋群体在人类历史和当今现实中,是如何在异性恋的霸权地位之下,受到种种压制的。对这种霸权的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是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并反思的。

另一方面,透过对同性恋群体(本研究中为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会状况、生活方式、行动逻辑,以及他们与社会、与城市权力支配系统的互动等等,作者向我们讲述了,当面对一个被认为“不正常”的人群、一种被认为“不正当”的行为时,自认为正常的强势社会群体、或掌握着控制/管理权的政府部门,是如何通过意识形态和种种制度,以矫正、规训、取缔、遮蔽等种种方式对其施行排斥的。而被污名、被压制者又是如何为自己的所欲及尊严而行动、而抗争的,他们所面对的困境又是些什么。我以为,作者在这一方面的发现和揭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狭义意义上的同性恋研究。它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社会是如何通过观念、符号、规范、婚姻家庭制度、国家权力、乃至现代城市的空间管理技巧等等,来对一部分人的生理属性、生活需要、行为权利等等实施否定和剥夺的。这个人群在这项研究中可能是同性恋者,在另一些情景下,完全可能是另一些人群。

讲到这儿,我想我大致可以这么解释有关学者逃避的问题了:

对涉及到人自身欲望/需要及行为的议题、特别是对那些被污名/被遮蔽的群体的研究,许多学者所以会有规避的倾向,其实正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会让我们从中照见我们自身——或者作为居于霸权地位的压迫者的可憎一面,或者作为同样居于被压制地位却不自知的、可怜而犬儒的一面,甚或两者兼而有之。

对这样的学术领域,自我屏蔽当然是规避的便宜方式,却无益。我所以寄望于魏伟的这项研究,内心所期待的,是它能够有力地开拓我们的视野、并修正我们的观念。

关于这部书稿的研究风格和学术成就,我想读者诸君自有欣赏和评价的兴趣及能力。我对国内外性别研究、性研究以及同性恋研究的有限了解,远不足以让我有勇气在这儿点评水准或提炼意义。不过我并不想掩饰,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我曾获得诸多的惊喜。

首先要感谢作者的,是他在这项研究成果中,出色地为我们演示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角色。身居对象群体与一般社会/学术界之间,社会学者在自觉于个人价值立场的同时,需要秉持社会学者的志趣和伦理,全面、客观而深入地向读者描述并解释他的研究发现。按说这应是社会学者的本分和基本功,但我深知,这很难,它其实是一项非常高的要求。而我不无惊讶地发现,在魏伟的这项研究中,圈内人—圈外人的边界,以及立场超越等等似乎并没有构成特别的障碍。我是想说,这次的阅读体验改变了我先前对这个研究领域曾有的某些刻板印象。这本著作还让我知道,同性恋研究可以是超越狭义意义上的族群权利伸张的、关涉到人类每个个体和社会整体的重要议题;而看似平和的学术性描述及诠释,也完全可以充满思想震撼力。

事实上,当收到魏伟这篇文稿的时候,我自己正在为一些不得

要领的社会学之思而苦恼。在这种时候，阅读这篇书稿，不夸张地说，让我有惊艳的感觉。

社会学的诸问题，如植根于认识论或方法论之中的各种二元结构（像行为—结构、文化—制度、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等等）、以及存在于各种观念和理论范式中的三元纠葛（如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社会—市场—国家关系、整体—社群—个体、行为—关系/交往—结构、个人—家庭/社群/社会—国家等等），还有如对认知对象的断片切割，以及概念化、类型化所带来的属性设定等，往往让一些深入田野的实证研究者困惑不已。此外，中国学者在对东西方各种外国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中，如何致力于反思甚至提炼，亦常常让人进退失据。对照来看，魏伟这项研究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像这本书的结构本身所展示的那样，在于它能够将欲望、行为、规范、身份、制度、表达、行动、交往、族群、社区、空间、组织以及国家等自然而流畅地糅合在一起，原本各有所属的种种理论范式被作者有机地纳入到了整体的研究框架中。对此，魏伟曾自谦地解释说，美国的同性恋研究已经有很多参照样本了。他在书中也确实为我们介绍了诸如倡导跨界综合研究的酷儿理论（queer）等的新图景。可是在今天，我们知道，以美国（以及其他各国）的研究成就为参照，来观察、描述中国的现实，并揭示背后的逻辑，这后者的工作是远比前者（了解国外理论）更为艰辛的学术实践——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正是年轻一代学者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本书的各章主题，并非以既有的学术概念及范式（诸如“性别研究”、“社会运动”、“社会—国家关系”、“社区研究”、“城市空间研究”与“性/性别研究”等等）为问题的出发点，而是作者直接从对象群体的属性特征或重要行动中捕捉、提炼而来。而在对各章主题的讨论中，中外学者的既有研究，既是他立论的参照，更是他商

权讨论的对象。

通常,当社会学者面对纷繁的新理论而感到难以触及对象本质时,“回归原理论”被认为是寻求突破的可能途径。而魏伟的这项研究让我意识到,“对对象本身的还原”同样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方式——对象自身所具有的整体有机性,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碎片化理论的依赖。

此外,我还特别注意到,在对各种后现代理论的运用中(同性恋研究与各种后现代理论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特别是对身份政治理论的运用中,作者始终没有将中国的问题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后现代社会的问题。同性恋在中国如何从不正常的“性倾向”、“性行为”演化为一种公开的“身份”,这是隐含于这项研究的主线,但其他的社会维度——如“阶层/阶级”维度——始终是作者洞察问题的重要视角;作者的研究还让我们了解到,“颠覆”并不是同性恋群体必然的社会性格,恰恰相反,大部分同性恋者认同且向往传统的、以相互忠诚和稳定为特征的性规范以及同居/家庭模式;与一些性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所不同,这项有关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学研究还明确地告诉我们,成都(及其中国)的同性恋群体,真真实实地形成于、生活于中国这一个不无特殊的转型社会之中,他们的境遇以及他们的行动逻辑,莫不与这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相关联。“中国”在这项研究中,不仅是行为者的背景或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一种方法,这令人欣慰。

魏伟的这本著作,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它充满了初涉新领域者的锐意。就我所知,作者回国后的这几年中,在学术上日趋成熟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种种研究/发表条件的限制。在坚持与调整之间,他一直在作着可能的努力。性别研究、性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依然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可是,学术的

进步，往往是边缘性研究所推动的结果，而很少会是主流派学术能够引导而成的。魏伟的这项研究让我对此深信不疑。

陈映芳

2012 年元月

致 谢

这项研究的进行以及最终成书,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学术和个人成长之旅,沿途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知识和情感支持,这项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在成都的研究参与者们,他们给予我的信任,愿意和我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才使此项研究成为可能。

我必须感谢我在洛约拉(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和朋友们。我的硕士导师 Laura Miller 教授,激发了我进行此项研究最初的灵感。她的个人学术研究所展现的严谨性和趣味性的精妙平衡,深深地影响了我个人的研究旨趣。在研究生院求学期间,我的博士生导师 Judith Wittner 教授不断给予我鼓励和支持,对此我将永远感激。除了把我带入引人入胜的性别和民族志的研究领域,Judy 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对学生的授课教学和研究指导中,为我和我的同学们树立了职业的榜样。Kevin Henson 教授、Fred Kniss 教授和

Lauren Langman 教授也对我个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我在这里还想特别感谢 Anne Figert 教授,2001 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在系里研究生休息室里的一次不经意的谈话,成为令我永世难忘的意识解放的一个时刻。

特别的感谢,要给予我在洛约拉的三个最挚爱的朋友和同学。Katrina Hoop 和我同时进入洛约拉学习,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起,她就用她无与伦比的聪慧、耐心和友谊,让我的寒窗苦读少了许多艰辛。Mahruq Khan 关于社会正义和社会多元的真知灼见,深刻地影响了我个人的研究。我们的每一次促膝交谈,都让我受益良多。曹婷婷(Grace Tsao)是我能遇到的最好的房东兼室友,在我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的三年中,她的关爱和包容使得这一过程容易了许多。别人可能认为依靠轮椅生活的她,总是需要得到我的帮助,而事实正好相反——Grace 给予了我太多的帮助,无论是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和文法,还是为我的购物开销提供最可行的计划。我还要同时感谢她们各自在波士顿、芝加哥和斯戈奇的家庭,总是对我敞开欢迎的大门,让我在异国他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庆幸的是,虽然相隔大洋两岸,时光飞逝,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情。除了 2011 年秋天的再次相聚,定期通过 Skype 的交流,也不时让我们有机会重温研究生院的那些围绕共同感兴趣的学术问题畅谈争论的日子。

在成都,因为这个研究而相遇的太多朋友无法在这里一一提及。在研究工作之余,和我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江华和雷刚不仅是我在同志世界中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真正的朋友,在教会我许多事情的同时,也为此项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支持。我当然还必须感谢王晓东、杨斗、王珺以及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其他成员。正是因为他们非比寻常的工作,值得我个人为此项

研究投入的一切时间和精力。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两位华裔同志前辈 Charles Damien Lu 博士和 Joseph Hu 博士对大陆的同志社区和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如既往的支持。

2006 年学成回国以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社会学系任教,有幸受到两位系主任仇立平教授和陈映芳教授的提携。当我作为一个新人,带着一个还有些敏感的“冷门”研究,在仇立平教授对后辈的悉心爱护和帮助下,能够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良好的学术氛围中,迈出学术成长的第一步。陈映芳教授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令我景仰,同事三年,于我亦师亦友的情谊,更让我珍视。此次她繁忙之中,为本书作序,让我在感激之余,更感应当努力前行,才不辜负陈老师的一片盛情。两系的其他同仁,平日里对我也有太多帮助和启迪,在此也一并感谢。

还有一些机构在此项研究的开展和出版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洛约拉大学的 Arthur J. Schmitt Fellowship 的支持下,我能够在成都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得力于“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的支持,我能够回国后对研究进一步充实,并进行相关学术发表。福特基金会“培育开放和多元的校园性别文化生态:课程开发和推广”项目为本书提供了出版资助,尤其感谢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 Susie Jolly 博士的大力支持。我还要感谢黄蔚女士、张经纬先生和盛亮先生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给予的帮助,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上海三联书店的钱震华先生的独到眼光和辛勤工作。

我想对我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谢意。我的父母一直支持我的研究,包括收集相关的媒体报道。最后,我要感谢我生活中的伴侣,他的善良、纯真、勤奋和才情,坚定了我对一个美好世界的信念。我的父母和伴侣是我最爱的家人,我把此书献给他们。

本书的第二章以“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为题发表于《社会》2007年第1期。

第五章以“圈里的‘名人’:公众形象、社会污名和同志社区代表者的建构”为题发表于《中国“性”研究》(第3期,台湾万有出版社,2007)。

第一、二、三、六章英文版的部分内容以“‘Wandering Men’ No Longer Wander Around: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Homosexual Identities in Postsocialist Chengdu, China”为题发表于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007年第4期。

第三章以“消费主义和‘同志’空间:都市生活的另类欲望地图”为题发表于《社会》2009年第4期。

第四章以“想象的社区:当代中国一个都会‘同志’圈子的民族志研究”为题发表于《中国城市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2)。

目 录

第一章 公 开	1
同性恋社会表现形式的历史变迁:从行为到身份	5
城市和“同性恋”: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命题	12
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重新界定	17
研究地点的选择	22
“圈外人”/“圈内人”的视角:研究方法和伦理	23
第二章 飘 飘	31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的同性恋身份	33
身份的寻找:在中国的语境下成为一个“同志”	39
“同志”身份的兴起:身份意识,技术革命和全球化	46
在日常生活中公开身份	54
本土文化的因素	62